

研究系与新文学的分化——从孙伏园出走《晨报》事件谈起

白颖超^{1*}

(¹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1924年10月, 孙伏园因与刘勉己发生矛盾而出走《晨报》。通过考察该事件的“前史”, 可以发现孙伏园于1924年在《晨报》遭遇的编辑权受限问题, 与1922年11月《晨报》主编更换存在直接关联。而《晨报》的人事更迭是研究系内部存在不同派别, 且各派之间存在利益分歧所致。通过梳理研究系内部存在的派别, 定义“湖北派”“福建派”所指的范围, 有助于从研究系的角度考察《晨报》背后的运作过程。而《晨报》内部的冲突之所以能够对“五四”新文学场域的分化产生影响, 归根到底是研究系在文化取向上趋近“英美派”而与鲁迅、孙伏园等人背离的结果。

关键词: 研究系; 新文学; 梁启超; 《晨报》; 孙伏园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6.838>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and the Divergence of New Literature — A Discussion Starting from Sun Fuyuan's Departure from the "Morning Post" Incident

Bai Yingchao^{1*}

(¹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In October 1924, Sun Fuyuan left the Morning Post after a conflict with Liu Mianji. Examining the 'prehistory' of this incident reveals that the editorial restrictions Sun faced at the Morning Post in 1924 were directly linked to the change of the newspaper's chief editor in November 1922. The personnel turnover at the Morning Post stemmed from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factions within the Research Faction, each with divergent interests. By delineating the internal factions—defining the scope of the 'Hubei faction' and the 'Fujian faction'—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al processes behind the Morning Po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earch Faction. The internal conflicts at the Morning Post were able to influence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May Fourth new-literature field precisely because the Research Faction's cultural orientation leaned toward the Anglo-American camp, thereby diverging from figures such as Lu Xun and Sun Fuyuan.

Keywords: Research Faction; New Literature; Liang Qichao; Morning Post; Sun Fuyuan

引言

1924年10月, 孙伏园因“抽稿事件”愤而从《晨报》副刊辞职。对于此事, 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田露《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1919-1927年北京报纸副刊研究》^[1]、邱焕星《导火线: 鲁迅〈我的失恋〉撤稿的背后》^[2]等为代表, 他们认为此事背后是研究系与

作者简介: 白颖超 (2001-), 女, 山东淄博, 硕士, 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通讯作者: 白颖超, 通讯邮箱: 1344312574@qq.com

孙伏园、鲁迅两派人之间思想不合、矛盾最终表面化的结果；另一种观点以夏寅《〈语丝〉体制之形成与北京的报刊出版——关于“同人杂志”与“小周刊”》为代表，他认为孙伏园因“抽稿事件”愤而辞职是因为其编辑权力收到限制，不必上升为派系倾轧，与其考察此事的原因不如关注这件事导致的在京新文化人的分化重组这一结果^[3]。

针对第二种观点，考虑到刘勉己的研究系背景，和鲁迅自民初以来对研究系一向持不屑态度的事实，因此很难说孙伏园辞职事件背后没有研究系的因素。而第一种观点不仅将孙伏园与刘勉己之间的个人矛盾上升为鲁迅与研究系之间的冲突，而且把《晨报》背后的研究系视作一个整体，也有简单化之嫌。如果鲁迅、孙伏园对研究系一直抱有敌视的态度，那么便无法解释孙伏园为何在1919年愿意进入《晨报》任其副刊的编辑这一问题。要想理清这一事件背后的派系因素，需要回到历史现场。本文拟从研究系内部派系的角度观照这件事的“前史”，通过观照此事件的“前史”，可以发现不仅《晨报》副刊在1924年10月发生过编辑权之冲突，而且早在此事发生的前两年，研究系内部就《晨报》更换主编的问题也曾发生过冲突。1922年11月，《晨报》内部“福建派”陈博生取代“湖北派”蒲伯英接管《晨报》主编职位，不仅使得《晨报》这一“研究系之报纸”^[4-1]展现出与之前不同的面貌，而且影响了研究系的文化取向，使得新文化场域中不同文化方案之间的冲突更为明显。

1 《晨报》主编的更迭与孙伏园出走《晨报》副刊

对于1924年10月孙伏园出走《晨报》副刊事件，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里将孙伏园与《晨报》的冲突称为“小纠葛”^[5-1]¹⁷¹，因此根据鲁迅的说法，孙伏园与刘勉己的矛盾实际并不很深。双方的分手更多是由于后者对于前者选稿权力的侵犯，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旁观者便已看清，例如章廷谦曾就此事致信胡适，称：“我想没有别的，只因两种势力不相容的缘故。大概此后的《副刊》，难免要改面目”^[6]。1966年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也强调了编辑权限的问题：“他的辞职，自说因为刘某擅自撤去《失恋》的原稿，实是内部编辑权限之争。”^[4-2]虽然引起双方冲突的矛盾点较为简单直接，但刘勉己留而孙伏园走的结局与《晨报》自身所属的研究系背景仍然有一定的联系。

考察《晨报》历年的主笔和副刊的编辑名单，可以看出《晨报》从未与研究系脱离关系，这份报纸一直掌握在研究系手中。与《晨报》“有深关系”^[5-2]¹⁶⁹的留学生刘勉己回国之后，之所以能够“挑战”孙伏园的编辑权力是基于他和研究系的密切关系——刘勉己密切交往的对象，是《晨报》中自1922年年底开始越来越多的“福建派”，而支持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的“湖北派”蒲伯英则早在1922年10月便辞去了《晨报》社长的职位。

研究系内分“汤化龙派”和“梁启超派”两大派别，而“汤化龙派”内部又基于各成员所出不同，分为“湖北派”与“福建派”。1919年至1922年11月担任《晨报》主编的蒲伯英是“湖北派”的代表，1922年11月以后，负责《晨报》编辑与出版的刘崇佑、陈博生、刘勉己等则是“福建派”的代表。

1918年汤化龙在美被刺身亡后，“福建派”在《晨报》的影响逐渐扩大，虽然1919年的《晨报》在蒲伯英的主编下，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主流讨论，吸纳了诸多青年参与《晨报》的编辑事务，使得《晨报》呈现出一种求新的文化面貌。但文化影响力的增大并不影响《晨报》的所属权转移，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湖北派”中的蒲伯英等人对相关事业的掌控力逐渐减弱，这一现象在华觉明的回忆中有直接的表现：“蒲殿俊于汤死后任《晨报》社长，对宣传‘五四’运动颇能有所贡献。后因业务管理不善，且与研究系的福建派发生意见，遂把《晨报》交给刘道铿、陈博生接办而自行组织新剧团”^[7]。据此仔细分析章廷谦所说的“两种势力”，大概指的就是“湖北派”蒲伯英及孙伏园所代表的于1919年新文化运动刚兴起时加入《晨报》的提倡新文化的青年，和自1922年开始逐渐全面掌管《晨报》的刘崇佑、陈博生、刘勉己和徐志摩等研究系中的“福建派”。

1919年至1922年10月，《晨报》在蒲伯英的主持下，于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多元共生”的话语氛围中，延揽了一批认同新文化的青年从事《晨报》的编辑事务，这些新编辑多是《新潮》社成员，如郭绍虞、孙伏园、陈达材、徐彦之等。1920年6月《晨报》中的“福建派”人物陈博生卸去《晨报》编辑职位，11月赴欧考察新闻，1922年陈博生回国后于11月1日接替蒲伯英任《晨报》总编辑^[8]，此时原本在《晨报》服务的《新潮》社人物都已差不多离开了，而

陈博生的接管更是使《晨报》里的编辑群体换了不少。最明显的改变是蒲伯英主持下、专由《晨报》编辑撰稿、创办于1922年4月30日的《一星期之余力》栏目在陈博生掌管《晨报》后的第五天(11月5日)宣布取消^[9],紧接着是一些《晨报》编辑跟随蒲伯英出走,如蒋人龙离开《晨报》担任蒲伯英主持学校(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的学监、谢明霄离开《晨报》任《实话》社社员^[10]。随着这些编辑的离开,陈博生主持下的《晨报》开始出现一批新的编辑,如怀沙、守素、涉江、德言等,与孙伏园有过摩擦的刘勉己更是陈博生留日时的同学^[11],随着《晨报》实际总编辑的更换,《晨报》首先发生的改变即为编辑群体的更迭。

陈博生主编《晨报》之后,《晨报》的文化取向也发生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晨报》副刊所发表作品对于戏剧的品评标准改变。与陈博生交往密切的陈西滢、徐志摩等人对彼时北京所提倡的新剧颇为不喜,有论者指出:“1923年的戏剧界正在酝酿着一场隐形的变革,留英归至北京的徐志摩、陈西滢等发现陈大悲所领导的北京新剧原来是这等模样,颇觉失望。”^[12]1923年5月、9月间,《晨报》副刊上接连登载诸多批评陈大悲及女高师学生演剧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表达了作者陈西滢和徐志摩对西洋戏剧的带有“绅士”色彩的艺术品味,而且与《晨报》正张上一篇带有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共同作用,展示了《晨报》编辑部中“福建派”对留英人士的支持以及对蒲伯英这一《晨报》“退园僧”^[13-1]的疏离。

1923年12月,蒲伯英所主持的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发生“倒陈”的风潮,有26名被开除的学生联合攻击陈大悲道德败坏,要求社会支持他们拒绝陈大悲在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任职的主张^[14]。在闹事学生发出“倒陈”传单的同时,《晨报》登载了题为《人艺剧专学校大风潮 学生举发陈大悲可悲之行为 因此革去二十六名优秀学生》的新闻稿,对这一事件进行介绍。不过这一新闻稿并不十分客观,一边倒地认可闹事学生所说的内容,认为这些优秀学生不应该被革职,而应驱逐“可悲”的陈大悲^[15],在这件事上《晨报》的立场显而易见地偏向学生、攻击陈大悲。身为校长的蒲伯英看到这则新闻后,写信质问《晨报》,他在给陈博生的信中历数《晨报》对自己所主持的剧专种种不敬之处:一为《人艺剧专学校大风潮》并未搞清楚事实便在本应客观的新闻稿中偏向闹事学生,二为《晨报》副刊9月底曾集中登载的暗讽、批评剧专教务长陈大悲的文章。蒲伯英认为这些都是《晨报》社社长陈博生不顾私人感情、有意为之的结果,而陈博生则解释道之所以轻信剧专闹事学生的说法、发布新闻稿以反对陈大悲,是为避免《晨报》“做一人一党底机关报底嫌疑”^[13-2],至于出现指责陈大悲译文有误的文章,完全是陈大悲自身犯错的结果。在说明《晨报》坚持的是客观的立场之后,陈博生重点申明了自己的编辑权限的范围:“先生说勒令副刊登载,未免太离奇了。副刊是《晨报》底一部分,我既然有编辑《晨报》全部底权限,无所谓勒令又勒令。”^[13-3]可见“福建派”在《晨报》及《晨报》副刊中的声量,因为陈博生掌握着主编权而获得极大提高。

对于已经不再掌控《晨报》的蒲伯英来说,攻击陈大悲的文章之所以出现在一直以来支持陈大悲的《晨报》副刊上,必然与陈博生对《晨报》副刊的干涉有关;而对于陈博生来说,在《晨报》副刊上登载自己朋友陈西滢等人的文章完全是在自己权限范围内的,并不需要顾及与原《晨报》总编辑蒲伯英的私情。可见由于双方文化取向、朋友派别不同,在《晨报》这个公开媒介上,双方已形成一种冲突,这种冲突由于《晨报》为“福建派”所掌握,后者最终占据上风。总之,正如有论者所说:“《晨报》落入福建派的手中,内容一再变质”^[16],在陈博生掌握下的《晨报》及《晨报》副刊,的确在编辑群体、作者群体、选稿标准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1924年1月29日,《时事新报》上登出《剧专风潮之始末》一文,文中称人艺剧专校董孙伏园为支持剧专继续开学,已制定好长期计划,同时该文讽刺了《晨报》在新闻稿《人艺剧专学校大风潮 学生举发陈大悲可悲之行为 因此革去二十六名优秀学生》中将剧专闹事学生称为“优秀份子”是别有用心^[17],《晨报》的偏心为人所睹。从孙伏园对蒲伯英所办人艺剧专的支持可以看出身为《晨报》编辑的孙伏园与《晨报》主编陈博生的不同立场,而支持蒲伯英的孙伏园在9个月后愤而出走则显示出《晨报》内部“福建派”人物对《晨报》的掌控逐渐加深的情况。

1922年11月《晨报》主编的更迭,是研究系机关报内部的一次人事变动,但这件事所引发的冲突,折射出新文化运动时期研究系内部派系之间的逐渐疏离。这种疏离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不同派系在文化取向、思想资源汲取上的差异,且这种差异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深。在孙

伏园出走《晨报》之后,《晨报》副刊转由刘勉己、徐志摩等人接编,培养了一大批文学青年;孙伏园也在鲁迅、周作人的支持下创办《语丝》,为将来“《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埋下伏笔。研究系的文化形象,也由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之一变为“比狐狸还坏”^[18-1]。而要完整把握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文化形象的转变及其与新文学场域分化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系各派系的组成、互动及文化立场。

2 新文化运动时期研究系的派别问题及其文化转向

因为《晨报》一直隶属于研究系,因此考察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派别及各派别的文化立场,对于理解《晨报》内部组成与1923年以后的文化转向具有关键作用。除此之外,理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研究系内部的各个派系,有助于理解研究系与新文学场域分化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失意,研究系的活动重点已经由政治转向文化,各成员之间的行动也不再如1918年以前那么具有组织性,尤其在1918年研究系重要人物之一汤化龙被刺身亡之后,梁启超也赴欧游历一年,不复问及政事,群龙无首,研究系党势衰颓。1920年,蒲伯英等人宣布“宪法研究会”消失、“同人中所有行动均属个人关系”^[19],这些都表明这一团体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逐渐由相对有组织的政党变为较为松散的文化团体。但因为《国民公报》《晨报》《时事新报》等在研究系从事政治活动时创办的重要报纸的存在,以及受梁启超个人魅力而追随其身侧的弟子群的存在,研究系文人在参与新文化运动时,仍呈现一定的团体性,并且这一团体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相对继承了之前的组织特点。

研究系具有“党内分派”“派内分派”的组织特色,从以下事实可以侧面了解研究系“党内分派”的组织特点:由梁启超、汤化龙、王揖唐等人组成的进步党在护国之役之后、宪法研究会成立前曾分裂为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的“宪法研究会”和以梁启超、陈国祥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两个团体,后来这两个团体又达成合作组成“宪法研究会”,可见研究系的组成本身来自于两个分别由梁启超、汤化龙所主持的团体,且二者之间是平等合作的关系。据曾跟随汤化龙加入进步党的成员李仲公回忆,汤化龙“与梁启超共同领导的进步党和后来组织的宪法研究会,在形式上虽然是汤、梁合组的政团,但在人事关系上不但汤是汤梁是梁,各有各的系统,即在汤集团内部也是存在着几个派系的。”^[20-1]¹⁰⁷ 据此,笔者将李仲公所说的“汤集团”称为“汤化龙派”,将梁启超所能影响的“系统”称为“梁启超派”。

据李仲公回忆,汤化龙领导的民主党内部,按照年龄可分为“元老派”和“少壮派”,按地域分,有以刘崇佑为首的“福建派”、以孙洪伊为首的“直隶派”和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派”,其中,“汤领导湖北派运用于福建、直隶两派之间,乃居于整个集团的领袖地位。”^[20-2]¹⁰⁸ 蒲伯英、张梓芳、胡瑞霖属于“湖北派”,刘崇佑、林长民、刘道铿、陈博生属于“福建派”,而李仲公属于“直隶派”,后跟随孙洪伊出走。不同的地域派别之间意见并不完全统一,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直隶派”与汤化龙、刘崇佑等人在是否倒袁一事上意见不同,最终孙洪伊率“直隶派”集体离开民主党,加入国民党。因此,1916年宪法研究会成立时,汤化龙领导的集团中只剩以刘崇佑为首的“福建派”和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派”。^[20-3]¹⁰⁹

在汤化龙领导的原民主党成员之外,研究系内部还有一大派别是“梁启超派”。“梁启超派”指梁启超及围绕在他身边的诸多跟随者,具体有张君勱、张东荪、蓝公武、蒋百里、黄群、林志钧等人。与“汤化龙派”存在“派内分派”现象不同,“梁启超派”中人物大多以梁启超为精神中心,彼此意见时常沟通,未因地域差异形成次级派系。

汤化龙所主持的政客集团以清末谘议局成员为骨干,其联合基础多为地缘关系和立宪运动中的合作历史;而梁启超因长期旅居海外,多依托师生纽带吸纳门生,形成人才网络。这种差异导致两派凝聚力截然不同:汤化龙派的知识分子彼此之间在政治主张、理论资源等方面的联合多是“合则留,不合则去”——若是某一方在政治理念上不再认同对方,随时可以结束合作以经营自己的理想,譬如李大钊主编《晨钟报》不久便离开该报,专心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但梁启超派则由于梁启超本人性格放达,弟子多倾慕其洒脱不羁的性情,即便存在异议也敢于直言^[21]。师生间在大政方针上高度一致,细节分歧则通过频繁交流弥合,故整体呈现“分层共存、聚而不散”的态势。

研究系的组成虽然有政治志向一致、成员阶层相同的因素,但乡缘、地缘和学缘等传统社

会团体聚合的条件仍是研究系内部成员开展活动的依据。1918年研究系和国民党在政治方面皆失势后,能够刺激研究系中汤化龙和梁启超两派团结的外部条件已然消除(此时国民党在北洋政府中已经失势),再加上研究系人物本身在政治方面的心力日渐松弛,研究系中人彼此间的交往必然更依靠旧有的传统关系和文化志向的相投程度,以往的人事关系在这时必然凸显,汤、梁两派的交往呈现出分裂的倾向也不难理解,所表现出来的研究系内部汤梁分派、派内有派的现象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有所表现。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结束后,当时报纸媒体对第一届国会议员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及政党主张颇为关注,有媒体分析了尚存议员所在的政治党派,认为1917年的研究系势力目前已分裂为以林长民为中坚的“林长民派”和以蒲伯英、蓝公武为中坚的“蒲伯英派”,更有报纸认为蒲伯英所主持的《晨报》在其带领下,自成一个有政治目的的“《晨报》派”。虽然蒲伯英发文否认所谓“《晨报》派”的存在,并称“我要和林长民中分我老早不要了的研究系来做‘换汤不换药之新组织’,这又是我个人绝对不能忍受的谣言。”^[22]但在许多媒体眼中,原研究系成员蒲伯英所代表的“湖北派”与林长民所密切接触的“福建派”在1922年已经不属于同一个派系,其分裂明显之现象已有目共睹,而与之相关的便是《晨报》这一由汤化龙主持创办,但由刘崇佑等“福建派”提供人才以维持的报纸主编权的转移问题。

虽然“梁启超派”和“汤化龙派”一样,在1919年之前,他们倚仗的知识资源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深厚的中国传统经史子集教育;二是在清末民初时期主要通过日本习得的西方思想与制度资源。但在“一战”以后,随着国内外思想界发生深刻变化,“梁启超派”的思想资源也发生了转化,他们更多地开始接受“一战”后来自欧洲的文化资源,如张君勱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倭铿的精神哲学影响,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如宋明理学)的现代价值,试图从中发掘能够弥补西方物质文明缺陷的精神力量;又如蒋百里将目光投向了更早期的欧洲,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他看重那个时代的个人主义精神、人文主义光辉,并认为这正是打破中国封建束缚、建立新文学的根本动力。与之相应的是,他们十分愿意欣赏并接近由英美留学生组成的“英美派”知识分子。在1920年3月梁启超等人欧游归国之后不久,当年4月,“福建派”林长民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身份,携女儿林徽因赴欧洲进行考察;当年6月,原在《晨报》任编辑的“福建派”陈博生也卸去在《晨报》的职务,准备赴英留学^[23]。可见“福建派”的文化取向也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偏向欧洲,逐渐与“梁启超派”的文化取向趋于一致。除在文化取向上的一致外,“梁启超派”与“福建派”在人事上也往来频繁。而研究系中“湖北派”的蒲伯英,其思想底色并未受到战后新思潮的影响,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坚持的是清末留日时期所接受的、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核心的西方启蒙文明观,交往人员也多是留日知识分子和国内认可新文化的青年,因此在文化取向上,与“福建派”等人逐渐不同。

1922年陈博生等人的回国,不仅影响《晨报》之后的编辑走向,而且使得新文化运动中所掩盖的思想冲突更加明显,同时新文化场域中的派系区分也更加明显,从而影响到新文学场域的进一步分化。李小峰在回忆孙伏园辞职事件时,曾论及《晨报》与《现代评论》派人物的亲近:“同他们意气真正相投的,乃是后来创办《现代评论》的那一批‘学而优则仕’的所谓‘正人君子’,而和鲁迅先生及孙伏园等是并不协调的。”^[24]“梁启超派”人物历来偏向英美文化和有英美留学背景的文化人士,而从英美留学归国的陈博生、陈西滢、刘勉己、徐志摩等人,更是促进了彼时研究系与北京文化界“英美派”的交往,这些都影响到研究系在外人眼中的形象。

3 研究系与英美派的交往与新文学场域的分化

在1922年陈博生等人回国以前,新文化运动尚未明显分化时,研究系及其所办文化事业,便早已与英美留学派建立了密切合作。韩石山曾观察到,文学研究会在1920年曾在石达子庙举办过一次会议,同时他以为此时的石达子庙即研究系所办共学社的社址,因此他得出结论,认为文学研究会之所以能够在石达子庙举办会议,与研究系人物蒋百里及其主持的共学社有直接关系^[25]。但实际上,1920年南池子石达子庙并不是共学社的社址,频繁活跃于此处的是以陆征祥等人为中心的欧美同学会^[26]。

欧美同学会之所以能够借给刚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开会,是因为研究系与欧美同学会的密切联系:双方不仅在人员方面有所交往——研究系的叶景莘、蒋百里、丁文江都曾担任欧美同学会

成员^[27]，而且在许多社会事业上也有所合作。例如，1919年梁启超担任理事长、林长民担任总务干事的国际联盟同志会租用欧美同学会会所办公，欧美同学会的成员蔡元培、顾维钧等人也曾加入国际联盟同志会^[28]。此外，在罗素访华过程中，欧美同学会也一直为负责此事的研究系人物提供活动场地：1920年12月，欧美同学会、北京大学与尚志学会、新学会等研究系文化组织合作，为罗素演讲提供场地，并在欧美同学会会址成立罗素学说研究会^[29]。

1922年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回国之后，研究系与在京英美留学派的关系比以前更为亲密，如果说1922年以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第一代知识分子与欧美同学会的合作是基于政见和文化观念的一致，那么以徐志摩、蒋百里为代表的研究系第二代知识分子和胡适、张彭春等人的交往，则更多的是一种审美趣味、文人习性的趋近。

徐志摩能拜入梁启超门下，得益于乡缘、亲缘与姻缘交织的关系网：他同乡表弟蒋复璁回忆，蒋、徐为镇上大族且有双重姻亲，徐志摩北大预科读书时借住梁启超弟子蒋百里家，蒋百里常与梁启超门下张君勱等人往来；而徐志摩父亲徐申如又因为商业关系结识张君勱家人，促成徐志摩与张君勱妹张幼仪的婚姻。^{[30-1][46-47]}1914年二人结婚后，在蒋百里等人介绍下，徐志摩借张氏之便得见梁启超，成为梁启超的门生。

徐志摩于1920年由美赴英留学之前，他对研究系的影响并未如何凸显，直到1922年冬徐志摩由英回国之后，他对研究系在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事业方面的影响逐渐增强：一方面徐志摩处于国内的英美留学生关系网中相对核心的位置，另一方面他持久地维持着与研究系核心人物的密切关系，在徐志摩的影响下，研究系与英美留学派的关系愈加密切，这影响了研究系1922年后的文化取向和研究系与英美留学派各自的对外形象。

蒋复璁曾回忆道：“在民国十三年时，北京的欧美留学生及一部分文教人每月有一聚餐会，我也因为志摩的关系，也参加了这一个聚餐会。泰戈尔来华后，聚餐会更多了，所以即将聚餐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30-2][51]}他所说的这个“聚餐会”始自1923年11月，参加的人物主要有胡适、徐志摩、张彭春等人，在诸多人的回忆中，徐志摩是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在徐志摩与英美派人士交往密切的同时，“梁启超派”与“福建派”人士以松坡图书馆为依托，彼此也常聚会：“中午则由松馆同仁轮流作东，共一桌，如季常先生及李藻孙、陈博生、林宰平、杨鼎甫、梁仲策、徐志摩诸人”^{[30-3][68]}。徐志摩和研究系“福建派”的关系颇为紧密，1920年他留学英国期间，曾与郭虞裳同住一处^{[31-1][367]}，而陈博生赴欧时所暂住的地方也是郭虞裳处^[32]，可知三人关系较为亲密。除此之外，徐志摩与林长民也在欧洲经陈博生介绍认识后交往甚密，结为挚友，1923年徐志摩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春痕》便是以林长民为主角原型的小说^{[31-2][151]}。以徐志摩为中介，张彭春等留美学生与研究系建立了较深的关系，例如，松坡图书馆为留住干事蒋复璁，由徐志摩将其介绍给时任清华学校教务长的张彭春，再由梁启超写信联系清华校长曹云祥，最终使得蒋复璁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教书，同时兼顾研究系松坡图书馆的事务^{[30-4][67]}。又如，1924年研究系文化组织共学社、尚志学会邀请泰戈尔访华，为此研究系人物与张彭春合作，排演泰戈尔的英文话剧《齐德拉》^[33]。

由于胡适等人与研究系人物交往过密，世人曾误会胡适加入研究系，而这种误会在当时体现了研究系在世人眼中形象如何。刘以芬曾回忆道：

以当日进步党之一二重要人物，视为研究系中心，以其个人之交际，目为研究系之活动，个人往来之朋辈，目为研究系新吸收之份子，罗文干因奥款事件，被诬入狱，刘崇佑为之辩护获雪，遂谓罗为研究系。胡适因罗关系，常偕访刘，一时并有胡亦加入研究系之传说。其他类此者甚多。^[34]

刘以芬的回忆证明了研究系在时人眼中“阴谋家”的政治形象，这与研究系人物多为“政客文人”有关：一方面他们的政治经历表现出他们善于抱团排斥国民党、联合军阀的政治特点，另一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使得他们在与反复无常的北洋军阀分手之后，转向文化界寻求更为长远的改良效果。虽然1918年在政治上彻底失势后，研究系转向文化活动，但他们民初的政治经历与政治形象，仍制约着外界对他们的看法。因此他们与教育界中“英美派”交往，难免使外界对其仍抱有某种政治目的的揣测累及“英美派”。1923年以后，随着国民党逐渐增强政治资本，早已失去实权的研究系在政治方面的消极印象，在后来日益复杂的北京政局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人“英美派”人物文化形象的判断。

例如，在鲁迅看来，顾颉刚因为和胡适、陈源等“现代评论派”核心人物交往颇为密切，

因此毫无疑问地属于“研究系”势力。有学者曾总结道：“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将具有国民党背景的现代评论派当作‘研究系’加以讨伐”，当鲁迅离京南下，去厦门大学任职时，“鲁迅再次有意或无意地将认同国民党的顾颉刚当作‘研究系’。”^[35]鲁迅这一判断，与鲁迅对于民初国民党与研究系之间频繁互相拆台的政治记忆有关，并非空穴来风。而鲁迅有意无意模糊了“现代评论派”与研究系之间的区别，恰恰证明这两者自1922年以来的密切程度已使得像鲁迅这样的外人无法区分。

1924年10月，孙伏园因与“福建派”人物刘勉己的冲突愤然出走，标志着鲁迅等人与《晨报》的彻底切割——失去这一发声阵地后，鲁迅、孙伏园等人随即创办《语丝》，以犀利直白的批判文风为旗帜，形成了“语丝派”作家群。而一年后，受研究系“福建派”人物陈博生等人的认可和鼓励，《晨报》副刊正式由徐志摩接手。徐志摩英国“绅士”式的文学审美趣味与鲁迅倡导的“猫头鹰式”批判精神形成对立，这一差异被鲁迅在《音乐？》中直接点破，暗讽其审美肤浅、回避现实，表现出双方不同的风格。徐志摩曾在《语丝》撰稿，在《音乐？》一文发表后，因为与鲁迅等人的理念冲突及圈层排斥，他不再给《语丝》投稿，最终彻底转向“福建派”所掌握的《晨报》副刊，且多与陈西滢等有英美留学背景的文化人士交往。与孙伏园主编时的风格不同，徐志摩所主编的《晨报》副刊呈现出“唯美、抒情、绅士化”的风格，推出《诗镌》《剧刊》周刊，聚拢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等文人。

1926年“三·一八”惨案成为双方对立的爆发点。研究系与“英美派”依旧延续“稳健”论调，这种回避血腥的态度彻底激怒鲁迅。他对研究系、“现代评论派”的憎恶达到顶点，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直言：“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18-21]。在新文学领域，“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间，也从风格分歧升级为不可调和的思想对立。至此，新文学阵营完成了从理念分歧到明确对立的分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因为研究系与“英美派”往来频繁，研究系素有的“阴谋家”形象累及“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等人，从而加剧了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对立，新文学场域由此呈现出“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两个不同的文学派别。

4 结语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研究系内的部分知识分子，早已与在京的“英美派”人物有密切关系，但这中密切联系所暗含的认同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取向，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新”与“旧”的二元对立下，并未展现出其独异之处，日后从各种主义出发产生的“混沌多歧的新文化方案”^[36]之间的差异、背后势力的冲突也没有在此时彰显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在1922年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研究系第二代知识分子归国之后，反而激发了研究系内部潜在的矛盾，并引起新文学场域的变化。本文无意全面评述这种变化，而是将视野局限于徐志摩、陈博生等研究系中“福建派”人物与“英美派”的交往，考察研究系的政治历史、文化取向对其文化形象的影响，而这种文化取向的变换最终使1923年之后的文坛呈现一种“绅士”与“学匪”的对立。

参考文献：

- [1] 田露. 20年代北京的文化空间——1919~1927年北京报纸副刊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87-92.
- [2] 邱焕星. 导火线：鲁迅《我的失恋》撤稿的背后[J].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6(11)：105-112.
- [3] 夏寅. 《语丝》体制之形成与北京的报刊出版——关于“同人杂志”与“小周刊”[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5)：44-45.
- [4] 鲍耀明编. 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M].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433.
- [5] 鲁迅. 我和《语丝》的始终[M]//鲁迅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6] 章廷谦致胡适[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94.
- [7] 华觉明. 进步党与研究系[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卷.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90.

- [8] 陈溥贤启事[N]. 晨报, 1922-11-1(2).
- [9] 本报编辑部启事[N]. 晨报, 1922-11-5(2).
- [10] 旅京广东潮汕义赈会敬谢[N]. 晨报, 1922-11-7(2).
- [11] 刘广定. 理性之光: 民国著名律师刘崇佑[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237.
- [12] 向阳. 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始末考[J]. 戏剧艺术, 2014(3):71.
- [13] 剧专风潮与本报 校长蒲伯英之质问 本报之答覆[N]. 晨报, 1923-12-22(6).
- [14] 剧专学生哀呼! [N]. 京报, 1923-12-21(2).
- [15] 人艺剧专学校大风潮 学生举发陈大悲可悲之行为 因此革去二十六名优秀学生[N]. 晨报, 1923-12-21(6).
- [16] 蒲殿俊与晨报副刊(下) [N]. 亦报, 1951-5-13(2).
- [17] 剧专风潮之始末[N]. 时事新报, 1924-1-29(7).
- [18] 鲁迅. 261020 致许广平[M]//鲁迅全集: 第1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81.
- [19] 声明[N]. 晨报, 1920-12-6(2).
- [20] 李仲公. 护国之役时的汤化龙及其集团[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北文史资料: 第八辑,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 [21] 丁文江致胡适[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382.
- [22] 蒲伯英. 制宪和组阁底先后缓急[N]. 晨报, 1922-7-25(2).
- [23] 渊泉启事[N]. 晨报, 1920-6-10(2).
- [24] 李小峰. 鲁迅先生与《语丝》的诞生[M]//鲁迅博物馆等编. 鲁迅回忆录(散篇): 上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287.
- [25] 韩石山. 徐志摩传[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107.
- [26] 欧美同学会开会[N]. 晨报, 1919-3-3(3).
- [27]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编. 欧美同学会简史[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4: 12、24.
- [28] 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之经过[N]. 晨报, 1919-2-15(3).
- [29] 罗素学说研究会开会[N]. 晨报, 1920-11-29(3).
- [30] 金庸等著. 旧梦: 表弟眼中的徐志摩[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7.
- [31] 陈学勇、于葵编注. 林长民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
- [32] 陈溥贤辞行[N]. 晨报, 1920-11-20(1).
- [33] 陈子善. 张彭春、新月社的诞生及其他[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3, (04): 121-131.
- [34] 刘以芬. 民国政史拾遗[M].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1: 24.
- [35] 许纪霖.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 1895-1949[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96-197.
- [36] 周月峰.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的演变[J]. 中共党史研究, 2017, (05): 128.